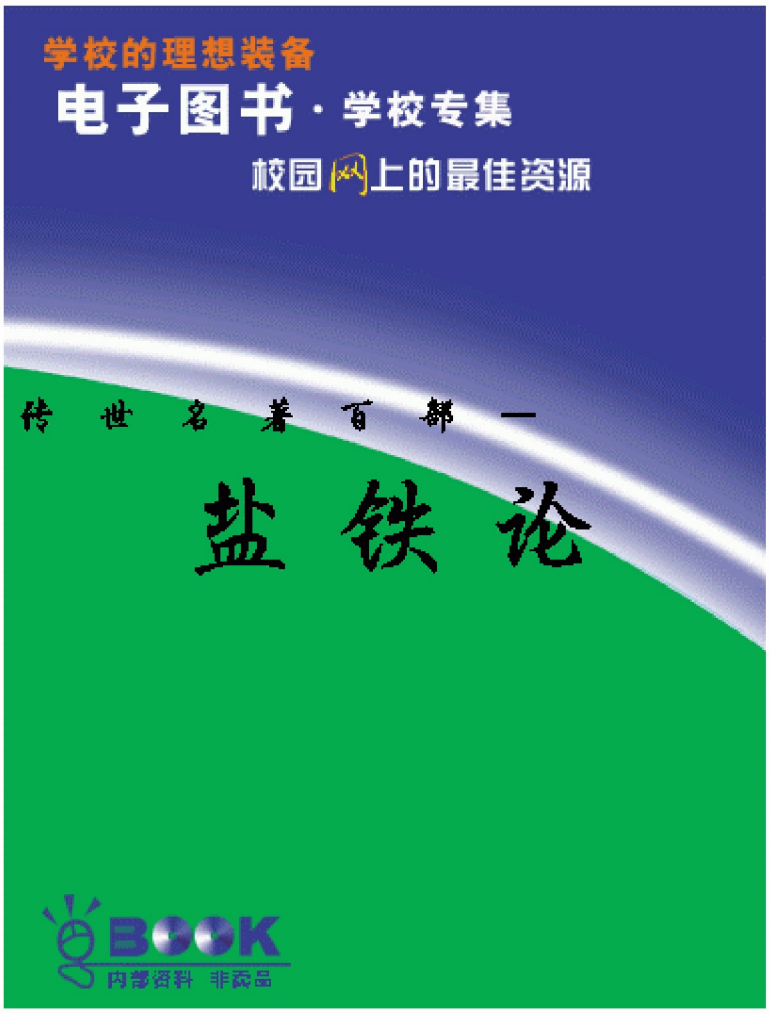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名著通览

在西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好几次防御性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毫无疑问，这些战争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细亚、欧洲、日本、南洋的交通；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民传播了汉族的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物质和文化，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所以能够创建如此辉煌，足令后代君王瞠乎其后的文治武功，他的雄才大略，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固然起着一定作用，然尤为重要的，就是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的创造，首先应归功于桑弘羊。

自从刘汉政权建立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工业，如冶铁、煮盐之类，都落入豪强和兼并之家手中。至武帝时代，由于采纳了主要是桑弘羊的一些策略，施实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对生产力的组织和生产品的“笼络”，都有了诚如《史记　平准书》所言的“言利事析秋毫”的精密安排，社会财富有着显著的增加，而刘汉政权的国力也随之与日俱增。西汉扬雄《法言　寡见篇》引曰：“弘羊榷利而国用足。”《汉书　食货志赞》指出“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皆由“弘羊均输”。《汉书　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称述汉武帝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是以兴造功业，制废遗文，后世莫及”，指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其中“运筹则桑弘羊”。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也正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大臣们倡行的一切财政措施给刘汉王朝的巩固统一和扩张势力造就了经济前提。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　自序》中就曾中肯地评说了桑弘羊的均输之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汉书　车千秋传》写道：“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兴榷　之利，伐其功。”这就更充分地说明对汉武帝时代兴盛景象的形成，桑弘羊为首的大臣们所倡行的财政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桑弘羊力倡“天下之利，皆命入官”，“富商大贾，无以牟利”，这样便剥夺了豪强和兼并之家的既得利益。《汉书　车千秋传》载：“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车千秋传》又写道：“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化可兴。御史大夫桑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这场发生在公元前 81年的“盐铁之议”，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杂儒”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纯儒”相互辩难，针锋相对，就连《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本人也称之为“战口”，王充在《论衡　案书篇》中也写道：“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在这场热烈而又尖锐的诘难中，出场人物有丞相、御史大夫和丞相史，御史以及贤良、文学 60多人，辩论了包括盐、铁、均输、酒榷等具有时代特色的诸多问题。这场辩论，在当时“虽颇有其议文”，后来通过桓宽的“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遂成流传千年的《盐铁论》。

《盐铁论》，又名《桓宽盐铁论》，也名《贞山子》。成就其书者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博通典籍，善于文

章，平生研习《公羊春秋》。他与同乡朱子伯交游深厚，后被荐为郎官。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他认为师法古人治国，以农为本，崇尚仁义，则久安长治；趋合世俗，以工商为本，专务权利，则朝危夕亡。朝廷官吏议论大事不可“括囊不言，容身而去”，不应“阿意苟合以悦其上”（《盐铁论　杂论》）。正是因为桓宽与朱子伯友善，才得援于朱子伯获知公元前 81年的这场“盐铁之辩”的详情。出于“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盐铁论　杂论》）的志向，桓宽对会议的原始记录进行加工整理，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丞相车千秋以外的与会者，塑造成四个鲜明的形象：御史大夫属员为御史，丞相属员为丞相史，来自民间 60余位贤良、文学合而为贤良、文学两人，从而书成。

《盐铁论》是一部记录西汉盐铁会议上争论各方思想观点的著作。就图书分类而言，《盐铁论》虽同刘汉王朝其他几次公开讨论的记录，譬如，为人所熟知的《石渠奏议》、《白虎通德论》等一样，但那些都不过是总结性的文件，仅仅有些干巴巴的条文；而《盐铁论》则很好地且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正反两方的论辩，其辩论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政治、财政、社会、外交和学术等诸多方面，无疑，这给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盐铁论》全书共 10卷， 60篇。其主要内容有：力耕、通有、复古、非鞅、晁错、刺权、论儒、园池、轻重、忧边、散不足、西域、论邹、申韩、周秦、大论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本议第一》至《取下第四十一》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管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的主题；《击之第四十二》至《大论第五十九》，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还附带讨论了法制与礼治等问题。《杂论第六十》，略同后序。

通观《盐铁论》一书，其论述的核心问题乃是本末。本即农耕，末着重是指盐铁、均输、平均、榷酤等政府所控制的经济事业。文学、贤良的“崇本退末”（《本议》）主张，要官府放松对末业的控制；而大夫的“本末并利”（《轻重》）政策，则是要维护官府垄断末业。大夫指出，“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本议》），农工商的关系是相互依靠，彼此促进的。因此，要“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又强调“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势在利居，不在力耕”（《通有》），将商业活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其所谓“本末并利，上下俱足”的提法，实为一种重末贱本的理论。贤良文学虽承认“商通郁滞，工备器械”的社会活动，但认为工商并非治国之本。他们认为当时的政策。使“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已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地广》）；要求朝廷“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水旱》）；认为如此这般便可以维护男耕女织的大业，缓和社会矛盾。桑弘羊等人顽强地反对“退末”之建议，认为这种“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取下》）的做法，必将造成“利归天下，而县官无可为者”（《取下》）的恶劣的后果。

本末问题之争与对匈奴的战和关系紧密。西汉朝廷来自末业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战争以及与战争休戚相关的事业。故而第一次盐铁会议结束之后，贤良文学以新任列大夫的身份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桑弘羊提出继承武帝抗击匈奴之遗愿，“欲以小举击之”（《击之》），当即遭到贤良文学的反对，并因此不得不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反复强调只有将对匈奴的战争继续下去，才能带来安宁和利益。战争虽会带来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但“边境强则中国安”（《地广》），

从长远来看“卒获其庆”（《诛秦》）。贤良文学对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表面上肯定，实则否定，谴责“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诛秦》），带来重负和困苦，将武帝晚年的“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完全归咎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西域》）。他们夸张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和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备胡》）。既然难以制胜，则不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合”（《击之》），以体现“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方针。

礼治还是法制，这是盐铁会议中辩难的又一重大问题。贤良文学强调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贤良文学认为“礼义立，民无乱患”；“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论诽》）。大夫指出，“异时各有所施”（《大论》），当今乱世不同于“敦朴之时”。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才能出现安定局面。文学贤良强调严刑峻法的统治“不可久也”（《诏圣》），危机只能由礼来解决。治乱不在于民，在于朝廷用什么政策引导黎民为善，防范百姓为恶。

经济、民族、政治方针的争论，同样又会引起哲学上的论难。文学贤良认为民之为善为恶，“非性之怵，风俗使然也”。而风俗的优劣与统治者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他们讲：“贫即寡耻，乏即少廉”（《国疾》），“故富民易与适礼”（《授时》）。桑弘羊则认为凡人皆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都追求荣华富贵，但“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疾贫》），教化并不能够改造人性，它只能辅助善者为善，而不能使恶者为善。在天人关系上，双方观点恰恰相反。主张性可教化的贤良文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水旱》）“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蜮■生。”（《论灾》）桑弘羊则以为阴阳自然运行结果造成灾害：“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水旱》）为了坚持当时的政策，大夫主张“时世异务”（《国疾》）。当政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天，而器械便于用也。如果信往道古，必乖于今”，“而不合于世务”（《刺复》），这样就会遭到失败。而贤良文学则表示反对，提出“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利议》），主张在复古的形式下着手改革。

《盐铁论》在文体上有所创新，它发展了汉赋的对话文体，于是又成为艺术价值很高的反映历史题材的对话体散文。它的记述井井有条、层层逼进，步步深入地将辩论中展开的主题思想阐述出来，并且，通过对话勾勒出了人物形象。《盐铁论》在总结这次辩论时如此写道：“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斌斌然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群略小辩，虽非正法，然臣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鲁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显而易见，作者完全掌握了参加这次论辩双方主角的特点，亦即这些典型人物的个性，从而方可活龙活现地刻画出这些历史人物的轮廓。通过对话，除了反映双方思想活动的过程以外，更重

要的是突出了典型人物语言的个性。《盐铁论》除了在对话中表现出桑弘羊的博通之外，还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桑弘羊丰富多采的语言天才。由于桑弘羊出生于商人家庭，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了使用语言的艺术，从而在辩论中，他正确地、大胆地使用了一些鲜活的语言。作者在书中如实地记录下来，强化了《盐铁论》的艺术效果。如《利议篇》桑弘羊拿“如品即口以成事”来嘲笑贤良、文学的人多嘴杂。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衬托出桑弘羊的机智和风趣，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盐铁论》里的人物对话，都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社会生活，贴切生动。桓宽对丞相和丞相史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把握，最是匠心独具，让人扼腕叹服。发言当中，丞相称说道家，丞相史称说儒家；丞相自称为“吾”，丞相史自称为“仆”；丞相自称“有司”，丞相史自称“大夫”；丞相称对方为“诸生”，丞相史称对方为“文学”。就这样，作者不仅很忠实地叙述了辩论的内容，而且很有特色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细微末节。这些细节描写，平添了几分历史现实的真实性。当第一部描写人物的颇有文采的史著《史记》问世不久，又出现了《盐铁论》这样一部对话式政治学术讨论论文集，这不能不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曾多次撰文为《盐铁论》鼓呼，在《三点建议》和《序盐铁论读本》中，力主将它安排到中国文学史课程表中。

《盐铁论》对于以后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的制定，都有所影响。其中的儒家思想，长期被视为可以“俾国家之政者”（都穆《序》），不但可以行之当代，而且可以施与后世。近代以来，除了继续有肯定贤良文学的见解外，还出现了研究称颂桑弘羊学说的著作。《盐铁论》所渗透的思想，任你千秋评说。不过，李卓吾先生有言：“盐、铁不可废”（李贽《史纲评要》卷八），“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李贽《藏书》卷十七《富国名臣总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世名著百部之盐铁论

全文及大意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方。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　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　　，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原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

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孔利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大意】

始元六年，汉昭帝发出诏书，让丞相、御史大夫和各地推选的贤良、文学讨论、询问民间的疾苦。

文学：治人之道，当宣扬仁义。不要引导他们追求财力。现在，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与民争利，这样不当，应该限制工商业，发展农业，才有利于民风的纯朴。

大夫说：匈奴背叛不服，边患不断，不得已要驻军防御敌人，但因边防费用不足，所以必须实行盐铁官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御外侮。

文学说：善于克敌致胜的人不必去打仗，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出动军队。只要修明朝政，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圣明的君主施行了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必要什么费用呢？

大夫说：匈奴在我边关烧杀掳掠，早该征讨，你们这些人不但不能上阵杀敌，而且企图破坏国家的备战计划，岂有此理！

文学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征服。况且，实行盐铁官营，以聚财供边防费用，也非长远之计。

大夫说：实行盐铁官营，加快流通，对农业、工商业都有利。

文学说：高明的执政者都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用礼仪来防止百姓的贪欲，以充实粮食和货财。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菜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圣贤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　驼，衔尾入塞，■　　马，尽为我畜，　　狐貉，采旃文　，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　■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厚。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　　旃　，不益绵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财货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衔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大意】

力耕，即努力耕种，这是文学一方面的主张。大夫则以“富国何必用本

农，足民何必井田”驳斥之。

大夫认为，国家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关卡集市，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国家积累的财富，一方面用于军费等各项开支，也预防天灾人祸时，用来救济百姓。

要使国家富强，不能只走一条路，发展贸易，互通有无，同样有利于国家。所以，要致富并非只有井田制一条路可走。

文学则认为，古时候鼓励人们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使遭到荒年，人们也不害怕。况且，经商易使人变得奢侈，唯利是途。经商靠投机取巧，等于不劳而获。总之，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行了。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鲒，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文学曰：古者，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衣布褐，饭土硎，铸金为锄，埏埴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悲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　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弦高贩牛于周，五　赁车入秦，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熔铸。《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　，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　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文学曰：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入，材木不可胜用。田渔地时，鱼肉不可胜食。”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虽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穷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　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　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意】

通有，就是通有无的意思。大夫列举大量事实，提出“均有无而通万物”，作为实行均输政策的理论依据，驳斥了文学的“力耕”之说和“远方之物不交”、不和外界往来的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

大夫说：全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在大都市，那是因为交通便利，贸易发达的缘故。自然资源本来是很富足的，只是分布不均，如果能够流通起来，大家都能过上富裕生活，再说，君子节制奢侈，但也讥刺俭约，太俭朴就是简陋。

农业和工商业进行交换，对彼此都有促进作用。

文学则认为：富裕在于努力耕种和爱惜财物，而不在于所居之处是否交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及各地财物的交换，使风俗败坏，生活腐化，皇上应该禁止。

错币第四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暗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为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大意】

“错”与“铸”同。就是铸币。文学主张民铸，大夫则认为必须官铸。

大夫认为：朝廷储备粮食，掌握货币，限制有余的人调剂不足的人，才不致于贫富悬殊太大。如果货币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那么这些人互相炫耀、互相倾扎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所以，只有国家统一发行货币，老百姓才不会发生怀疑，也不会奢望得到不义之财。

文学则认为：古人崇尚道德，鄙视功利，不以得财多为美，所以上上下下都能温饱。而自从货币出现以后，人们为争利而变得越来越虚伪。官方造币，因官吏们偷工减料，出现大小厚薄不同的现象，甚至还掺杂假币，所以容易造成混乱。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朐邴人、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至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异，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其平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大意】

本篇讨论禁止耕者营盐铁之利的问题。

大夫说：如不实行盐铁官营，地方豪富就越发膨胀，最终危及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实行平准法，就是为了避免少数豪富操纵市场物价，使百姓的利益得到保护。

文学说：天下的财富都是天子的，他不用去争夺，而只是分藏在诸侯百官及百姓的手里，他不用追求工商之利，而是注重用礼仪教化百姓。再说，由官方制造农具，农民未必实用，至于转运盐铁，既麻烦又费钱，弄得百姓非常痛苦。

复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庶众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沫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大意】

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焦点仍在盐铁，但大夫也引证，搞盐铁官营也是古制制定的。

大夫说：施行盐铁官营，不仅仅是为了得些利润，还在于杜绝割据势力、互相兼并的事情发生。要知道，“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天下之专利也”，国家公有的资源，岂容中饱私囊。我们现在应胸怀大志，继承先帝之志，积蓄力量，以防匈奴之入侵，没时间听你们的空谈。

文学说：盐铁官营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实行并传之后世，也非圣明治国之道，可以说守小节而失了大体。另外，陷于同匈奴的战争，将给百姓带来痛苦。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者归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剌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遇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逾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臣计而涉大道也。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亡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　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　子路于季孙。

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